

想我的母亲

□梁实秋

我的母亲姓沈,杭州人,世居城内上羊市街。我在幼时曾侍母归宁,时外祖母尚在,年近八十。外祖父入学后,没有更进一步的功名,但是课子女读书甚严。我的母亲教导我们读书启蒙,常说起她小时苦读的情形。她同我的两位舅父一起冬夜读书,冷得腿脚僵冻,取一大竹篓,实以败絮,三个人伸足其中以取暖。我当时听得惕然心惊,遂不敢荒嬉。我的母亲来我家时年甫十八九,以后操持家务尽瘁终身,不复有暇进修。

我同胞兄弟姐妹十一人,母亲的煦育之劳可想而知。我记得我母亲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们洗澡。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,我怕痒,总是躲躲闪闪,总是格格地笑个不停,母亲没有工夫和我们纠缠,随手一巴掌打在我身上,边洗边打边笑。

北方的冬天冷,屋里虽然有火炉,睡时被褥还是凉似铁。尤其是钻进被窝之后,脖子后面透风,冷气顺着脊背吹了进来。我们几个孩子睡一个大炕,头朝外,一排四个被窝。母亲每晚看到我们钻进了被窝叽叽喳喳地笑语不停,便过来把油灯吹熄,然后给我们一个个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,被窝立刻暖和起来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我不知道母亲用的什么手法,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的温暖舒适,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快乐的,可是那个感受不可复得了。

我从小不喜欢喧闹。祖父生日日照例院里搭台唱傀儡戏或滦州影。一过八点我便掉头而去进屋睡觉。母亲得暇便取出一个大簸箩,里面装的是针线剪刀一类的缝纫器材,她要做一下缝缝连连的工作,这时候我总是一声不响地偎在她的身旁,她赶我走我也不走,有时候竟睡着了。母亲说我乖,也说我孤僻。如今想想,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偎在母亲身旁?

在我的儿时记忆中,我母亲好像是



没有时候睡觉。天亮就要起来,给我们梳小辮是一桩大事,一根一根地梳个没完。她自己要梳头,我记得她用一把抿子蘸着刨花水,把头发弄得程光大亮。然后她要一上房有动静便急忙前去当差。盖茶碗、燕窝、莲子、点心,都有人预备好了,但是需要她去双手捧着送到祖父母跟前,否则要儿媳做什么?在公婆面前,儿媳永远是站着的,没有座位的。足足站几个钟头下来,不是缠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!最苦的是,公婆年纪大,不过午夜不安歇,儿媳却要跟着熬夜在一旁侍候。她困极了,有时候回到房里来不及脱衣服倒下便睡着了。虽然如此,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。

母亲爱她的家乡,在北京住了几十年,乡音不能完全改掉。我们常取笑她,例如北京的“京”,她说成“金”,她有时也跟我们学,总是学不好,她自己也觉得好笑。我有时学着说杭州话,她说难听死了,像是门口儿卖笋尖的小贩说的话。

我想一般人都同意,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都是最好吃的。我的母亲平常不下厨房,但是她高兴的时候,尤其是父亲亲自到市场买回鲜鱼或其他南货的时候,在父亲特烦之下,她也欣然操起

刀俎。这时候我们就有福了。我十四岁离家到清华,每星期回家一天,母亲就特别疼爱我,几乎很少例外地要亲自给我炒一盘冬笋木耳韭菜黄肉丝,起锅时浇一勺花雕酒,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。但是这一盘菜一定要母亲自己炒,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样了。

我母亲喜欢在高兴的时候喝几盅酒。冬天午后围炉的时候,她常要我们打电话到长发叫五斤花雕,绿釉瓦罐,口上罩着一张毛边纸,温热了倒在茶杯里和我们共饮。下酒的是大落花生,若是有“抓空儿”的,买些干瘪的花生吃则更有味。我和两位姊姊陪母亲一顿吃完那一罐酒。后来我在四川独居无聊,一斤花生一罐茅台当晚饭,朋友们笑我吃“花酒”,其实是我母亲留下的作风。

我自从入了清华,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就少了。抗战前后各有三年和母亲住在一起。母亲晚年喜欢听评剧,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,因为离家近,打电话给卖飞票的,总有好的座位。我很后悔,我没能分出时间陪她听戏,只是由我的姊姊弟弟们陪她消遣。我父亲曾对我说,我们的家所以成为一个家,我们几个孩子所以能成人,全是靠了我母亲的辛劳维护。三十八年以后,音讯中断,直等到恢复联系,才知道母亲早已弃养,享寿九十岁。西俗,母亲节佩红康乃馨,如不确定母亲是否尚在则佩红白康乃馨各一。如今我只有佩白康乃馨的份了,养生送死,两俱有亏,惨痛惨痛!

■推荐语

孩子由母亲那里得到的教育,大多并非来自语言,而是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细节慢慢地浸润、渗透,形成家族固有的性格或做派。从本文来看,梁实秋的母亲对孩子似乎并没有灌输什么做人的大道理,但是她幼时的苦读、成家后的勤勉、侍奉公婆的孝顺,无一不是对孩子的身教,足以令孩子受益终生。

名家言

苏曼先生

□刘增人

如果有人想描写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传奇人物,我建议选取苏曼先生作为蓝本。如果有人想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多么博学的人物,我也建议以苏曼先生为例证。

1959年秋,山东师院中文系招收了240名新生,编为四个班,我在四班。那时的山师,只有三座教学用的楼房,据说是余修副省长主持修建的。房顶都是一水儿的翠绿色琉璃瓦,套用某笑星的术语,那是相当的壮观。三座楼曾被戏称为“千佛山下三座庙”,也是上世纪50年代“反浪费”的“典型案例”之一。中间一座最大,当时叫“文化楼”,东边的叫“教学一楼”,西边的叫“教学二楼”,倒也容易记忆和辨识。中文系在教学二楼。当时,几乎所有课程都是大班上课,240人齐刷刷地聚集在一间联合教室,真是蔚为壮观。只有外语、语言学概论、现代汉语等少数语言课,才小班上课。

教授语言学概论的是苏曼先生。学兄们私下说,这位先生可“不简单”,头上的帽子就有两项:一曰“教授”,二曰“右派”。也有人奋起反驳,说仅仅是“讲师”而已。对于前者,学兄们似乎兴趣不大,因为并非苏曼先生“专属”;而对于后者,却非常新鲜,可能是因为“稀缺”吧。苏曼先生的外貌,就非同寻常:硕大的脑袋,庄严地安装在不足一米六的身材上,显得异常招眼。稀疏的头发,每一根都安排得恰到好处,从无散乱失态。脑袋大,就证明学问多,是否教授,学兄们也就不太计较了。苏曼先生一口极其标准的普通话,发音的音程、音速、口型……都准确到无可挑剔。要知道,我们那个年级里,可是有不少学兄是探听、通晓学界典故的专家,尤其是诸师的学养、家世、癖好、祖籍乃至主要流传在老师们之间的外号,也都门儿清。用时髦的尊称,或许就应该叫做“学霸”吧!

苏曼先生讲到国际音标时,就由他的助教崔西璐先生帮助,把各种图标一一展示在黑板前。为了让大家明白国际音标的好处,他特地让崔先生事先挑选出各地方言的“代表”发音。我是潍坊人,就让我说“好是好,就是老了”,土得真是“掉渣”。班长赵玉清是滕县人,就说“勒福(二叔),老福(老鼠)掉进非冈(水缸)里,福得福得的(胡达胡胡的)”。学兄王斯籍籍贯郓城,他表演的是“爱乐哼哼哈哈汤”(昨天晚上吃的什么饭)”。淄博的学兄真真切切地甩掉了所有“儿化音”,让大家听到“小孩”、“铜钱”、“眼眼”、“麻线”之醇正的淄博版。日照的则演说起“登边出了个恒益头,腾衡腾衡”(东边出了个红日头,通红通红)……

然后苏、崔二先生就指导我们用国际音标一一注出。每种方言的表演之后,往往是哄堂大笑或交头接耳。出了名的枯燥的语言学概论课,居然变成了各地方言的纠正课以及同学之间感情的交流课。匆匆五十多年过去了,这些往事,依然历历在目。真不能不敬佩当年老师的苦心孤诣、用心教书。但不久,苏曼先生就迅速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,谁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,也无从得知他的过往与生平。老同学相聚,也很少有人能够描绘出这位像“流星”般掠过我们课堂的老师的背影。

最近,我却无意中得知先生的履历,极想写出来以供也如我一样渴望知道先师行状的学兄参考与批评。如下:

苏曼,又名苏漫,苏上达(1898.4—1972.11),辽宁辽中人。先留学日本,后赴美留学,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。1926年任上海民国大学教授。曾任沈阳商务印书馆经理、沈阳东北交通用品制造厂经理、天津精华书局经理,被民国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新疆省银行经理,被盛世才任命为新疆省设计委员会副委员长。1934年至1944年被盛世才投入监狱十年,曾与毛泽民、陈潭秋等人关押在一起。盛世才离开新疆后苏曼才出狱。此后先后在重庆大学商学院、四川大学、成华大学、山西大学等校的工管系任教授。1955年8月起任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。1957年被打成“右派”,1958年降为讲师。1968年被捕入狱,被关押10个月。1972年11月在聊城病逝。著有《广告学纲要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)、《广告学概论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)等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、青岛大学教授)

心机学

多一些“高贵的低头”

□陈鲁民

近期,剑桥大学人类学家、历史学家艾伦·麦克法兰先生应邀来华访问。旅程中,在飞机上、火车上,他见到了太多的“低头族”,无论男女老少,几乎人人都低头看手机。当他走进深圳图书馆时,却十分惊喜地发现,居然有那么多的孩子在认真低头读书,不由地发出感叹“这是高贵的低头”。麦克法兰在“低头”前面加上形容词“高贵的”,既是对记载人类文明书籍的赞誉,更是对读书这一高雅行为的褒奖。

由此也引发了我的联想。前几天,在去北京的高铁上,我捧着一本《老子》在看。看着看着,突然觉得自己很另类,因为周围的人大都在低头或刷微信或打游戏或看韩剧美剧。我又有意地走了几节车厢,见到有一个外国人在聚精会神地看书,并感动了一个中年妇女,她要给这个老外拍张照片,说是带回去教育孩子。她的两个孩子一个读大学,一个读中学,都是“低头族”,平时爱玩手机不爱学习,成绩很差。

说到大学生里的“低头族”,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,我在大学任教,最头疼的就是如何提高学生的“抬头率”。因为一上课,满目望去,抬头听讲者最多也就是三分之一,余者大都是在低头玩手机。提醒一下,能好上几分钟,过了一会又旧态复萌,沉浸在手机中。

如果说读书是“高贵的低头”,那么,玩手机就是不那么高贵的低头。“高贵的低头”,是为了学习知识,广博见闻,提高素质,增强本领,“高贵的低头”多了,将来就肯定会抬起“高贵的头”,建功立业,一鸣惊人。反之,少了这“高贵的低头”,腹中空空,不学无术,未来想抬头恐怕也抬不起来,想出头就更不可能。毕竟,没有哪个单位招人时会问应聘者看过多少韩剧打过多少游戏,而大多只会关注应聘者的文凭、四六级证

书、计算机证书等,这些都是靠坚持数年“高贵的低头”换来的。

一个常年飞747大客机的空姐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:头等舱旅客看书的较多,或曰“高贵的低头”,公务舱旅客看杂志或用笔记本办公的较多,经济舱旅客看电影、玩游戏、聊天、睡觉的较多。在机场候机厅,贵宾厅里面的人大多在“高贵的低头”,普通候机区基本上都在低头玩手机。于是引起了她的深思,到底是人的位置影响了行为,还是人的行为影响了位置呢?但愿她的“励志故事”会引起众多“低头族”的注意和思考——如果想有辉煌的明天,就请你也多一些“高贵的低头”。

当然,“高贵的低头”除了立身处世的需要,同时也可以享受读书的欢乐。当我们坐拥书城,沉浸于知识的海洋,

可神交于无数伟人大师泰斗,可洞晓千百年来的风云变幻,可领略五湖四海的旖旎风情,可神游魅力无穷的未来世界,尽情享受“高贵的低头”带来的精神愉悦。况且,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长期而自觉的“高贵的低头”,会使得我们耳濡目染,潜移默化,成为底蕴厚重的高雅君子,会像海德格尔所说的“诗一样地栖息在大地上”。

